



经43天艰苦战斗,我军最终取得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上甘岭战役中,我军后勤人员付出巨大牺牲

《上甘岭》背后的上甘岭战役

■黄岩

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56年摄制的电影《上甘岭》,是新中国第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的经典影片。该片根据电影文学剧本《二十四天》改编而来,取材于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以日记体形式,从战士的视角,讲述了某部8连指战员坚守上甘岭阵地、浴血奋战,最终取得胜利的生动故事。60多年来,这部电影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中国人。

五圣山与上甘岭

上甘岭是五圣山南麓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五圣山位于“三八线”以北30公里处,南距金化5公里,海拔1061.7米,是朝鲜半岛中部的绝对制高点。五圣山与其东面的西方山一起,构成志愿军半岛中部防御的重要战略支撑。在五圣山南面山脚,有5个比主峰矮半截的高地,宛如张开的5根“手指”。之后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便是其中的“中指”和“无名指”。

战斗打响后,志愿军将这两个高地组成的阵地合称为上甘岭。上甘岭屏护着五圣山主峰,若上甘岭有失,则五圣山防守压力倍增。因此,在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的43天时间里,敌我双方在这个仅能布下两个连兵力、面积仅有3.7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展开激烈

争夺。敌先后共投入6万余兵力,坦克装甲车170余辆、飞机3000余架次,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我军也先后投入4万余兵力,发射炮弹40余万发。

影片开始时,我军师长从防御态势入手分析,向8连连长张忠发明确了坚守上甘岭与巩固五圣山的关系,并重点阐明守住上甘岭与保全五圣山之间的利害关系。这一情节,真实表现出我军始终坚持军事民主的优良传统,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军是有严明纪律的先进组织。

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连队

影片中8连的原型——第15军45师134团3营8连,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连队。淮海战役中,他们是突破双堆集大门大杨围子的纵队尖刀连。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该连在几十分钟内接连攻下7个山头,打退敌4次反扑。上甘岭战役中,8连指战员受命于10月18日夜投入战斗。在之前的5天里,由于敌火力封锁,增援高地的各连队伤亡较大,往往一个连队仅有十几人能进入阵地。危急时刻,8连成功地全建制登上高地,除5人伤亡,其余140余人全部进入预设阵地。《第十五军军史》评价道:“这是19日大反击的胜利基础。”

在随后的战斗中,8连指战员立足坑道、主动出击、坚持战斗,犹如两颗钢钉牢牢守在五圣山主峰前,极大配合了主峰的防守。战役结束后,该连被中央军委授予“上甘岭特功八连”荣誉称号。

送进坑道的苹果

影片中,师长特意让师部炊事员老王带给8连连长张忠发两个苹果。当老王九死一生摸进坑道后,苹果先是被送给重伤员吃,但重伤员们只是闻了闻,又让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吃。最后,这两个苹果被切成薄片,分给每人一片。

战场上的真实情况是,面对志愿军的坑道,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一方面想尽办法破坏坑道,另一方面,发挥其火力优势,切断五圣山到上甘岭间的所有物资输送线,试图令我各坑道弹尽粮绝。

志愿军不惜伤亡地向坑道内补充给养。一开始送去萝卜,但吃多易烧心,还会出现腹泻。为此,后勤部门连夜从平壤采购4万公斤苹果。然而,由于敌炮火严密封锁,大堆物资送不上去。最后仅有一个苹果,因被火线运输员刘明生在运送弹药时捡到而被带入坑道。整个战役期间,前沿运输人员的伤亡达到1716人,占伤亡总数的14.8%。

坚强的支部领导

影片中,为保存有生力量,8连全连撤入坑道。面对战士们不理解,留在阵地上的7连指导员建议“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依托广大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稳定了战士们思想,战斗情绪也高涨起来。

现实中,在战斗到10月21日时,为避开火力杀伤,8连仅剩的16人(含伤员)再次退入坑道。此时,坑道内共有来自16个不同连队的80多人(含伤员55人)。当天夜里,134团2营教导员李安德带领从师警卫连和本团其他单位抽调的近百人摸进坑道。按照上级指示,以8连为主组建坑道党支部,形成战斗核心,并明确坑道内所有人员一律编入8连,统一进行指挥。

在随后的战斗中,坑道党支部带领新组建的连队,克服武器不足、物资缺乏等困难,坚守坑道。正是得益于坑道党支部的建立,避免了建制混乱、指挥失灵等问题的发生,成为取得坑道作战胜利的关键。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巩固了我军在半岛中部的防御体系,为最终促成停战协定签订发挥了重要作用。影片《上甘岭》浓缩再现了参战部队英勇杀敌的事迹,今天看来依然感人至深。

在很多以特种作战为题材的电影中,可以看到特战队员搭乘运输机、潜艇和直升机多种运输工具,以伞降、潜水等方式进入任务区域完成任务。这种机动模式,被称为机动接力。

所谓机动接力,简单来说,就是连续利用车辆、舰艇、飞机等交通工具,采取潜水、空降等方式将特战队员送至作战区域,整个机动过程犹如接力跑。通常在长途机动或敌情复杂的情况下采用,且需得到整个作战体系的支撑。

特战队员具备三栖作战能力。为躲避敌雷达侦察,或远距离快速隐蔽进入任务区域,特战队员通常选择“高跳低开”的伞降方式作为机动接力的开端。不同于常规跳伞,“高跳低开”的跳伞高度通常在3000米以上,特战队员除携带作战装备外,还需携带应对高空低温、低压、低氧的生命维持装备,如防寒服、氧气罐、面罩和气压表等。

若着陆点在海上,特战队员需驾驶提前预置的舟艇,或乘坐前来接应的舟艇与潜艇、舰艇会合。这就涉及操舟、海上定位和航路规划等技能。与舰艇会合,涉及航行中的舰船攀爬、小艇吊放等技能。与潜艇会合,特战队员必须掌握水下进出潜艇、操作蛙人运载器、水下精准导航定位、使用水下枪械等技能,并能耐受水下高压、低温和昏暗的环境。

到达陆地后,特战队员还要具备驾驶、排除车辆一般故障、规划路线和选择渗透点等能力,其他诸如射击、爆破等作战技能更不用提。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都组建了能够在陆地作战的特种部队,但具备高空伞降和水下作战能力的不多。

部队具备全域投送能力。机动接力具有投送手段多、投送地域广、投送时效快的特点。从投送手段来看,涉及航空、水上、水下和陆路4种机动方式。从投送地域来看,涉及海洋、丛林、山岳、高原和城市等复杂地形。从投送时效来看,突出全域高效机动,快速到达。

战略空运是特战队员实施远距离快速机动最灵活可靠的方式。大型运输机可直接将特战队员从本土投送至海外。然而,全球具备战略空运能力的国家屈指可数。同时,将特战队员精准空投至任务区域,还涉及飞行技术、航路规划、气象和情报保障等。

再看水下投送。潜艇与其他运载工具相比,隐蔽性更强,航程更远,尤其是战略核潜艇。所以,利用潜艇投送蛙人一直是各军事强国重视的战术手段。考虑到潜艇安全,不能离海岸线太近。太近或易搁浅,或暴露作战企图。这就使蛙人潜行距离过长,投放和回收难度增加。若只靠蛙人自身携带的氧气罐和作战装备,机动距离有限,而且无法应对水下昏暗

寒冷、乱石丛生的复杂环境。这就催生蛙人运载器和蛙人输送艇。蛙人输送艇好比一个微型潜艇,安装有动力、导航、通信和声呐系统,大大扩展蛙人的活动范围。

部队具备密切协同能力。顺利将特战队员送至任务区域,离不开各军兵种间的密切协同。因此,此类行动通常建立层级较高的指挥部,统筹协调所有参战兵力,制定协同方案,明确情报、通信和气象等保障问题,规划机动路线,挑选接应、渗透地点,明确协同方式和备用方案。有了方案还要看执行效果。如果其中一环出现差错,一线指挥员能否有效处置特情贯彻上级意图、及时与上级建立有效通讯汇报情况,指挥部能否迅速调整机动方案统筹其他兵力,均关乎机动接力的顺利进行。军兵种越多,运载工具越多、机动距离越长,时间越紧,敌情越复杂,协同的难度就越大,具体执行过程就越容易出错。这对部队平时的协同训练,指挥、通信、情报网络建设等提出极高要求。

特种部队的「接力跑」

作战体系支撑的机动接力

■止戈

古人为何常以兵器随葬

■袁琼蕊

中国古代墓葬中,经常会以兵器作为陪葬品。著名的“春秋越王勾践剑”就是典型例证。在对一系列古代墓葬的考古发掘中,都有数量不一的兵器出土。古人将兵器作为随葬品,有多方面考虑。

兵器随葬现象最早出现于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此现象最为常见且随葬兵器数量巨大。学者普遍认为,墓葬中放置兵器,可能是为表明墓主具有一定军事身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乱频仍,军功贵族阶层崛起。至西汉时期,军功贵族始终在统治集团内具有重要地位。因此,这一时期,具有军事身份者普遍存在兵器随葬现象,且墓主级别越高,随葬兵器种类越多、数量越大。

秦汉时期,随着统一政权的建立,社会逐渐稳定,中央政府开始加强对军功贵族和地方豪强的控制,限制普通臣民大规模拥有和买卖兵器。

秦始皇曾收缴各地兵器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十二”。西汉也通过各种方式削弱军功贵族,打击各地豪强。汉景帝时期,丞相周亚夫之子就因为私购五百甲盾用于葬事,被人诬陷告发,致使周亚夫最终绝食而死。

这一时期,大规模兵器随葬现象逐渐减少,兵器明器(指古代陪葬器物)化现象逐渐增多。即以其他材料参照兵器形制制造随葬兵器,其不具备杀伤性,无法用于实战。

兵器明器化现象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但从出土文物看,当时的“兵器明器”尚较少。至汉代,这一现象已相当普遍,尤其在高等级墓葬如帝陵和列侯墓中,陶俑随葬兵器均为明器。

除象征墓主人军事身份外,西周至秦汉时期的“厚葬”思想也是这一时



“春秋越王勾践剑”,出土时置于墓主人身体左侧

固于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古人以兵器随葬,也是希望兵器能够起到护卫墓主的作用。这明显体现在兵器的摆放位置上。通过研究在陕西地区出土的汉墓可知,除弩机,随葬兵器大多置于棺内。刀大多置于人体上肢骨右侧,剑多置于左侧,符合当时人的佩戴习惯,即“剑之在左,青龙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其他兵器放置于墓主四周。

各种礼制需要也是古人以兵器随葬的重要原因。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西汉初期,叔孙通制定礼仪制度。汉武帝时期强调礼制的儒家获得独尊地位。此后,儒家礼制在中国古代占据重要地位。兵器在礼仪中能发挥独特作用,如持戟礼、护卫礼和迎送(即迎送)礼。墓主以兵器随葬,是希望兵器能继续发挥礼仪作用。

除护卫和礼仪作用外,墓主将兵器随葬的又一重要考虑是辟邪,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常见。这一时期,战乱频仍,疫病横行,加之佛教、道教和谶纬之学兴起,古人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安宁,因而转向宗教和神秘世界。这使带有玄幻色彩的文化兴盛一时。迎神、辟邪、驱鬼等成为时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也影响了墓葬形式。

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弩机具有驱邪压胜之功效。弩机随葬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但至西汉晚期这一现象仍不常见。东汉、魏晋时期弩机随葬数量的明显增加,恰与谶纬、玄幻之学的兴盛时间高度重合。就具体摆放位置而言,弩机有时置于棺外随葬。若置于棺内,多位于棺内四角或头部、身体两侧,以四角各置一弩机最为常见。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前不久,香港媒体拍摄了一部8集纪录片《守护香港的故事》,介绍香港警务处下属各警种的情况。“飞虎队”(即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警察机动部队特别任务连, Special Duties Unit,也被称为SDU)亦有出镜。

片中,“飞虎队”队员在攀爬钢索梯时,采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大多数人在攀爬钢索梯这样的软质梯时,会像攀爬木梯等硬质梯那样,双手双脚位于梯具的一面,脚踏横杆向上攀爬。“飞虎队”队员在攀爬钢索梯时,手臂会绕过梯具,从另一面抓住横杆向上攀爬。除双手外,还有队员会将一只脚绕过梯具脚踏横杆攀爬。



《守护香港的故事》截图,“飞虎队”队员攀爬钢索梯

爬梯子的门道

军事行动中的梯具攀爬方法

■贾静茹

“飞虎队”队员为何采用这种特别的爬梯方法?这与梯具本身的特性有关。

军警用梯具大致分为软质梯和硬质梯两种。软质梯主要有绳梯和钢索软梯两类,可折叠。硬质梯主要由钢材、合金、碳纤维、木材和竹子等硬质材料制造,部分可伸缩。由于材质不同,这两种梯具的攀爬方法也不同。

软质梯的上端,一般固定在直升机、舰船或楼房上。梯具垂而下,下端接触地面或悬空。如果软质梯下端可接触地面,便固定在地面。如果地面无固定点或条件不允许,可依靠1至2名队员的身体重量进行稳定。软质梯下端有受力点,攀爬难度就会降低。

软质梯处悬空状态或单兵使用时,如果采取正面攀爬的常规方法,由

于下端无受力点,队员身体重心就会成为梯具的一个支点,手抓梯具会使其向队员身体靠近,脚踏横杆会使梯具远离队员身体,队员攀爬的这段软质梯会形成一个斜面,这个斜面会随队员的攀爬一直存在。队员为稳住身体,手臂会一直处于屈臂锁臂状态,体能消耗较大。

为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发明了两种办法。第一种即为“飞虎队”队员使用的方法。其仍属于正面攀爬,但一只脚由梯具一侧绕过,以脚后跟脚踏横杆,两只手臂也绕过梯具,双手反握横杆。这种方法像“抱住”梯具那样,使其紧贴队员身体。同时,由于梯具受到不同方向的外力,合力会使其形成的斜面角度变小,攀爬起来更省力。第二种是侧面

攀爬。双脚脚跟分别从梯具两侧脚踏横杆,双手也分别从两侧抓握横杆或钢索,使身体紧贴梯具侧面。由于软质梯受到向下的合力,以及侧面弯曲的自由度较小,侧向斜面角度也不大,也能节省体力。

硬质梯多用于海上临检拿捕行动、城市反恐行动。梯具顶端为弯曲钩状,梯子背面有支撑杆,攀爬难度相对软质梯来说较为简单。钩状前端和支撑杆顶端通常会覆盖一层橡胶,防止挂梯或队员攀爬时发出声响而暴露,还能增大接触面摩擦力,防止梯子滑脱。同时,1至2名队员可在硬质梯下端发挥稳定作用。攀爬时,多采用同手同脚的方式,而不是我们走路时左手右脚、右手左脚的方式。